大国衣冠经纬之间见礼序

胡书明

看点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唐代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

当我们在谈论中华文明时，“衣冠”二字始终如一条隐秘而坚韧的丝线，串联起数千年历史的碎片。贾玺增教授的《大国衣冠：中国传统服饰图典》，正是沿着这条丝线展开的追寻。衣冠从来不只关乎蔽体御寒，更是一个文明对天地秩序、社会结构与审美理想的综合表达。在一针一线、一冠一履之间，流动着的是一个民族数千年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创造。



一套衣服承载半部《周礼》

古代中国之所以被称为“衣冠王国”，绝非因为服饰数量的庞大或工艺的繁复，而是因为衣冠在这个文明中被赋予了极为罕见的象征密度与制度厚度。贾玺增在书中指出，衣冠之美是中华文明对秩序、审美与礼仪的共同记忆，蕴含着古人对天地秩序与礼仪制度的崇尚。这是一条延续数千年的文化脉络，从先秦的宽袍大袖到唐宋的华美锦绣，再到明清的精致刺绣，衣冠的演变不仅是审美的升华，更是民族精神的凝聚。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中国早期服饰并无严格性别区分，多为男女同服，汉代之后才逐渐显现出性别着装差异。这个细节提醒我们，“衣冠王国”并非一开始就完整定型，而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周代命妇的“六服”制度、帝王群臣的冕服弁服体系，将不同性别、不同身份、不同场合的着装规范编织成一张极为严密的礼制网络。正是这种将服饰纳入文明顶层设计的文化选择，使衣冠超越物质层面，成为一种文明的等级性表达。所谓“衣冠王国”，本质上是“礼”的王国。一套衣服所承载的，几乎是半部《周礼》的文明重量。

一条圆领见证民族融合

《大国衣冠》最有力的部分在于，它将服饰还原为具体的人与具体的生活。贾玺增通过翔实的史料告诉我们，一件衣服的领型、颜色、材质，如何在无声中划定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汉代方领多用于儒服，《后汉书》“勃衣方领，能矩步，辞言娴雅”的记载，使这种领式甚至成为儒者的代称；商代石人像上的对襟衣则让我们看到3000年前贵族的从容姿态。阶层之别，不待言语，衣领之间已然分明。

更具历史纵深的是圆领袍的演变轨迹。这一源于北方游牧民族骑射生活的领型，在魏晋南北朝传入中原农耕服装体系，因保暖性与活动便利而逐渐普及，到了唐代，“几乎成了一种适用各种场合的服装款式”，进而“演变成一种礼服”。这条圆领的“北漂”之路，从实用到礼制，从边缘到中心，背后是民族融合、生活方式变迁与文化价值重估的宏大叙事。一件衣服的迁移史，暗含着半部民族融合史的缩影。

一款设计昭显礼制规仪

女性服饰的演变是全书最具文化张力的篇章。贾玺增以扎实的文献功底和图像资料，描绘出一幅中国古代女装演变的画卷。周代命妇“六服”均为上下连属的形制，寓意女德专一，这一设计绝非偶然，而是礼制传统对女性角色的深刻规范。祎衣为玄色，“其色至尊”，余下五服以青、赤、黄、白、黑序之，一丝不苟。

然而，礼制的刚性约束与女性对美的柔性追求之间，始终存在着微妙的博弈。魏晋时期褙衣的裙摆“上广下狭，如刀圭”，从顾恺之《洛神赋图》中可见其飘逸出尘之姿；唐代罗衫轻薄如雾，张祜笔下“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的诗句，道尽了那个繁盛时代的浪漫与热烈；明代鞠衣与大衫霞帔则以纹饰和饰件的等级差异，构建起命妇身份的识别系统。

从这些演变中可以看到，礼制传统如何通过服饰这一日常之物渗透进古代女性的生活世界。它既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赋予；既塑造了秩序，也意外地催生了在秩序内部绽放的审美创造力。礼与美、制与欲之间的张力，正是古代女装演变最具魅力的深层动因。

一袭罗裙揭示审美变迁

若论全书令人兴趣盎然之处，莫过于那些关于经典女装的故事。石榴裙的传说，将唐代审美风尚与政治权力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据传天宝年间，群臣从唐明皇之令，凡见到杨贵妃须行跪拜礼，而杨贵妃平日又喜欢穿着石榴裙，后世遂以“拜倒在石榴裙下”指称对女性的倾慕。一个关于时尚的逸事，同时也是一则关于权力与性别的寓言。元稹“窣破罗裙红似火”、万楚“红裙妒杀石榴花”的诗句，更是将这条红裙的视觉冲击力推向了极致。

马面裙从宋代旋裙起始到清代鼎盛，凤尾裙与马面裙的合流，展现了服饰形式的继承与创新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发生。百子衣上绣有一百个童子，场景涵盖斗蟋蟀、戏金鱼、放风筝等，这不仅是吉祥寓意的集中表达，更是一幅生动的明清社会风俗画卷。《红楼梦》中袭人身着“桃红百子缂丝银鼠袄子”的描写，则让文学与服饰史相互印证、相互照亮。这些故事背后，是社会风尚的流转，是审美趣味的变迁，更是文化心理的深层表达。

衣冠的褶皱里藏着历史真实的温度。当我们今天谈论“中国风”时，不应止步于对传统元素的简单复制，而应理解这些元素背后的文化逻辑与审美精神。贾玺增的这部著作，透过衣冠看见一个立体的、鲜活的、充满智慧与美妙的古代中国。那些曾经摇曳于历史风中的裙裾与衣袂，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文明对礼与美的永恒追求。

州桥夜市百味杂嚼

孙南邨

当年，北宋京城汴梁有一个州桥夜市，小吃是其一大特色。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州桥“正对于大内御街”，出朱雀门“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燠肉、干脯……水晶鲙、煎夹子、猪脏之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在众多的小吃中，还有旋煎羊白肠、旋炙猪肉皮煎烤等物；另有一味“辣脚子”，有书把它标点为“辣脚子姜”，有书注释为畜类的腿，网上有说是芥菜疙瘩。

在宋代还没有辣椒，当时制作辣菜多用的是姜、芥。州桥夜市就有姜辣萝卜、芥辣瓜儿。《千字文》有言“菜重芥姜”，“重”在其味。这“脚子”之“辣”，想必是出于姜、芥之类的调味品。

“脚子”，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有“羊肉一脚子卸成事件”，或“羊肉一脚子煮熟切细”，还有“羊肉二脚子”“羊肉三脚子”，这带“肉”的羊“脚子”与腿相连，看来这“一脚子”是羊的1/4。清末胡朴安等人编纂的《俗语典》也说：“物之有四脚者，四分之一各为一脚。今食肆中有此语。”然而，清代杭州施鸿保《乡味杂咏》“烧鸭烧鹅”又有一说：“嫩鸭肥鹅上架烧，晚风柜外一登摇。只须论件休论脚，仔细盘中拣腿条。”原注：“原只切分四块，谓之‘脚’；分切小件块，谓之‘件’。论‘脚’卖则多骨，论‘件’则精肥皆肉也。”“脚”在这里仅表示数量，与鸟兽畜禽的腿脚并无关系。

“辣脚子”辣的是四脚兽畜还是两脚禽的脚子？州桥夜市小吃与“辣脚子”前后排列的菜食有红丝、批切羊头、辣脚子、姜辣萝卜、夏月麻腐鸡皮等。按照这个排序推想：羊血、羊头后边是否辣羊脚子？可是，辣羊脚子倘若是《饮膳正要》所言的羊肉一脚子似乎有点太大了，已不是小吃“杂嚼”，而是一味大菜，与夜市小吃一条街摆卖之物不相符。

《东京梦华录》的《饮食果子》中也提到“羊脚子”，接着是“点羊头”。脚、头二菜相连，由此可知前面所说的“辣脚子”当是“辣羊脚子”。清郑光祖《一斑录杂述》“羊脚馔”记有：“冬月收鲜羊爪风干，至春夏用之。煮使极烂，去骨，盛小碗，浇以红烧鸡肉汁，蒸令入味，面糁砂仁末。”这里说的“羊脚子”就是“羊爪”、羊蹄，此乃因时因地异呼，一物多名而已。因此可以这样说：州桥夜市的“辣脚子”，十有八九是辣的羊脚子。

羊的头蹄，好汉吃得，祭品上得，常人更是多有特爱这一口者，自然在当年汴梁夜市美食小吃一条街中，也有人摆卖辣羊脚子了。

一花一木存风雅 一芳一菲寄幽怀

胡艳丽

■提示

红丝绒封面触感温软，烫金纹样绘着岁朝清供的图景；三面书口印着连绵花影，动时似有光影流转……《此间花木》不像一本书，倒像一件气韵悠远的艺术品，引你走进草木有灵、清芬悠远的古典中国。

任疆此前以《此间鸟兽》赢得口碑，此番则将目光转向花木。他说：鸟兽承载先民对力量的崇拜，花木则扎根农耕文明本源。16种花木，每一种都是入口，典籍与器物互证，观读之间，诗意盎然，通向的不仅是植物世界，更是中国人“借物观心”的精神长卷。



花木寄情

中国人大抵是世上最擅长在草木间生发意义的族群。桃树被读出“宜室宜家”的祝福，莲荷被赋予“出泥不染”的品性，松柏被称赏“凌风劲节，负雪贞心”。这不是文人的凭空附会，而是数千载岁月中，一代代人将情感与愿望投射于花木，再经由器物凝固的漫长过程。

任疆沿16种花木逐一铺展，梳理中国人借草木安放情感的路径。梅从《诗经》“摽有梅”中物候与婚嫁的关联，到林逋“梅妻鹤子”的孤高隐逸，再到陆游“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坚贞自许，一步步走向士人风骨；荷从周敦颐《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品格，到民间“莲年有余”的吉祥祈愿，交织着道德与世俗的双重意涵；竹则从礼乐文明中的实用材料，经由“本固、性直、心空、节贞”君子四德，成为士大夫的人格镜像。

我尤爱书中葫芦的篇章。周代婚礼的“合卺之礼”将一只葫芦剖为两半，夫妇各执一瓢对饮；战国彩绘凤鸟双连杯与西汉青铜鎏金朱雀衔环杯，正是这一礼俗的回响。文人笔下，葫芦褪去神异，化作腰间一壶浊酒。一只葫芦里，装着中国人对“壶中日月长”的向往。

花木流芳

器物上的花木，从不只是装饰。任疆要追问的是：花木纹样如何从大自然的馈赠，演变为凝聚文明的制度符号与精神密码？

竹的篇章最能见出这种深度。截竹为管，吹出礼乐文明的悠远回声；削竹为简，在纸张尚未降生时，刻下诸子百家的争鸣；以管束毫，为后世书画埋下第一笔锋芒。白居易从“本固、性直、心空、节贞”八字中读出君子四德，竹便从林间草木化作士大夫的人格镜像。一枝竹，撑开几乎整个传统中国精神生活的穹顶。

桑树则通向更为深阔的层面。蚕桑曾托举无数代人的日常生计，但古人的想象远不止于此：他们以桑为原型创造通天神树“扶桑”，让桑成为连接天地的神话通道；国君祭祀身穿蚕丝祭服，将桑蚕织入国家礼制的核心；《诗经》“隰桑有阿，其叶有难”的吟咏，又让桑林成为男女情思与日常劳作的温柔背景。上承神话，中系礼制，下连生计与情爱，一株桑树，织尽人间烟火，牵动千古想象。

书中一共写了280余件文物，涵盖青铜、陶瓷、金银器、书画。但任疆的笔不止于器物，他从《山海经》《诗经》到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梳理花木如何入情、入诗、入画、入梦。

明成化青花月影梅纹盘上，弯月挂于梅梢，青花淡描间是“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清雅；清同治款黄釉粉彩梅鹊纹碗，把“喜上梅梢”的祝愿绘入日常饮食；南宋高浮雕持荷舞女石刻，少女一手执荷、蹁跹起舞，荷从自然物走进人的姿态。器物与典籍互证，诗心与画意交融，花木便成为流淌在民族血脉中的文化基因，生生不息，不断嬗变。

花木问心

读罢全书，我想起任疆引述杭侃教授的那句话：“此间花木”蕴藏着的实际是“此间中国”。花木问心，问的究竟是什么？我想，答案应该是：中国人如何通过花木来定义“人”的位置。中国人从不把自己置于征服者的位置，而是近乎知己的相认。梅的凌寒、菊的傲霜、莲的出泥不染，皆是人在花木身上辨认出了自身精神世界中难以言传的部分。于是花有了人的性情，木有了人的风骨。人以花木为镜，花木以人为知己，在千年诗书与器物中彼此唤醒、彼此成全。中国人问心于花木，花木则以自身的存在方式，给出了关于坚韧、清雅、气节与从容的答案。

16种花木，每一种都经历了从自然物到文化符号的漫长旅程。木兰从离骚坠露走向辛夷禅心，兰从秉兰祓除走向义结金兰，桃从长生辟邪走向世外桃源……这条旅程没有终点，因为花木所承载的意义仍在被每一代人重新阅读、重新赋予。任疆所做的，是邀请我们去注视那些刻在青铜上、绘在瓷胎上、书在画卷上的花木纹样，倾听它们无声的语言。

合上书本，我想起书中那些花木，想起它们被镌刻、被描绘、被吟诵的时刻。花木不语，器物亦沉默，但人已然与之相遇，在那一刻，兰之幽、菊之淡、松之贞，与血脉深处的某种东西悄然重合。何以中国？或许正是这草木与人、器物与心魂之间，不曾断绝的千年相认。

书市观澜

简牍重估与双向互文

——解读秦史出版虚实共生现象

姚雪痕

2026年的秦史出版呈现出一个极具标志性的行业新特征：虚构与非虚构两条赛道不再各自独立，而是同根同源、双向互文引流（互文性理论，指不同文本之间相互关联、彼此指涉的关系），共同掀起了一场由出土简牍驱动的秦史叙事重估热潮。

本年度集中上市的秦史图书，以睡虎地秦简、《赵正书》等出土简牍为史料基础，形成“学术专著+通俗考据+历史小说”产品矩阵，向上剖析郡县制、徭役体系等顶层制度逻辑，向下描摹基层小吏、普通百姓的个体生存境遇。虚构创作与非虚构考据共享同一批简牍史料，彼此带动流量与读者转化。

三组数据直观印证这一共生趋势。选题结构数据：上半年秦史新书中，依托出土简牍进行叙事重构的占72%，学术专著《重建秦史》、通俗读物《大秦小吏》、长篇小说《秦二世必须死》，均大量引用简牍记载，形成统一的史料底座，这是虚构与非虚构能够互相引流的前提；读者转化数据：电商平台销售统计显示，购买秦史历史小说的读者中，有41%同时选购同主题通俗考据类图书；而阅读通俗秦史读物的读者中，有27%购买历史小说。这种跨品类购买行为，打破了以往文史虚构与严肃考据读者群体割裂的状态，形成阅读圈层的流动；短视频平台内容传播数据：秦史相关图书曝光量中，小说IP衍生内容占58%，通俗考据解读占34%，学术著作解读占8%。虚构故事承担流量入口职能，将大量读者引流至非虚构考据作品，完成从故事消费到史料思辨的阅读递进。

在这一格局下，历史可能性小说异军突起。所谓历史可能性小说，区别于完全架空的历史演义，恪守“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准则：王朝兴衰、关键人物最终结局等历史大框架尊重史实，场景细节、未被史书记录的心理活动等，则依托史料推演出多重可能性。《史记》对于胡亥之死、秦帝国崩塌的记载文字有限，留下大量历史空隙，《赵正书》对沙丘之变等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为这类小说提供了巨大的推演空间。《秦二世必须死》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该书4月14日上市，首印30万册，上市24小时即启动紧急加印，当月登上实体店新书虚构类榜首。

《秦二世必须死》之所以能够引爆市场，首要原因在于，它踩中了简牍重估热潮带来的认知缺口。小说吸收简牍研究的新结论，没有简单地把秦朝崩塌归于个人恶行，而是将其放置在制度磨合、六国旧势力复辟、基层治理压力的完整链条中考察。读者通过小说获得生动故事，再转向通俗考据读物，去验证书中依托简牍推演的制度逻辑，形成“读故事—查史料—再思考”的阅读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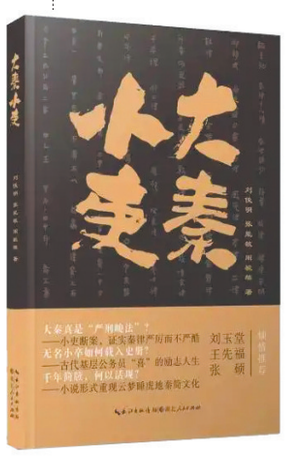
虚实赛道的双向引流放大了作品热度，《秦二世必须死》热销，让大量读者开始追问：沙丘之变究竟是不是后世编造？秦代徭役残酷程度究竟如何？这些疑问直接带动了非虚构图书销量上涨。反过来，学术作者通过短视频解读简牍新成果时，也会引用小说中的情节，降低了学术观点的理解门槛。虚构作品负责破圈引流，非虚构作品负责夯实认知根基，二者共同推动大众对秦史的认知更新，形成良性循环。

■荐书



《重建秦史》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本书以出土简牍、金石文物与传世文献互证，重审“沙丘之变”公案，对汉代层累形成的暴秦叙事予以系统性辨析。全书以札记体展开，跳出单一文本叙事，从秦代制度、行政体系入手，拆解后世叠加的历史叙事，还原秦帝国复杂的治理图景，是2026年秦史非虚构作品的代表性出版物。



《大秦小吏》
湖北人民出版社

本书以睡虎地秦简为基础，以秦代基层法吏“喜”为原型，是典型的简牍驱动型历史小说。作品借断案、徭役、户籍等日常政务，从底层个体视角补足制度史图景，把枯燥的秦律转化为鲜活的社会现场，把出土文献转化为大众文学叙事，重新审视秦代基层治理，实现考古史料与文学想象彼此赋能。



《秦二世必须死》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6年秦史出版标志性历史可能性小说。全书依托里耶、睡虎地简牍等新出土史料，跳出汉代定型的暴秦叙事，重新推演沙丘之变与秦帝国崩塌的内在逻辑。作品不拘泥于传统定论，以合理的历史想象，勾勒朝堂博弈与制度危机，借文学叙事把秦代制度史推向大众，激发读者追溯原始史料。